

当前在线: 406

国学网 - - 中国经济史论坛 / 论著评介 / 近代史著 / 农业、农村、农民 / 《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目录、编者的话

### 《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目录、编者的话

2006-06-01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点击: 940

#### 《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目录、编者的话

### 《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目录、编者的话

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6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2)



### 目 录

编者的话.....	1
· 主题论文 ·	
近代中国农村的村民结合与村落共同体	
—— 以华北农村农耕结合形式研究... ..	张思...1 ...

#### 旧版文章

####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国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传统与现代的交错、纠葛与重构

— 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权力体制的历史变迁

... ..	王先明	常书红	45	... ..
民国时期河北农业灾荒研究...	池子华	刘玉梅	72	
华北农村的生态关系与阶级 ... ..	王建革		118	...
乡村社会中的革命：组织、“敌人”与控制.....	陈德军		139	
嵌入式社会变迁及其界限				
— 对浙北一个村落的个案研究 ... ..	张乐天		192	
质疑近代中国乡村史的概念化书写 ... ..	张佩国		222	
·域外专论·				
农村社会——研究笔记.....	[日]滨岛敦俊			
	沈中琦	译	255	
一个封建堡垒中的革命：				
陕西米脂县杨家沟，1937—1948... ..	[美]周锡瑞			
	章可	译	280	
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 .....	Kathleen Hartford			
	Steven M. Goldstein			
	孙青	译	322	
·书评选刊·				
范式创新与终极关怀				
— 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 ...	陶鹤山		367	
·学术演讲录·				
耶稣会士的历史、政治、教育和文化背景...[德]	朗必榭		379	
·域外汉学·				
德国汉学：起源、历史演变和现状 .....	[德]阿梅龙		389	
·附 录·				
与本辑主题相关的论著目录(英语部分) ... ..	章可		401	
与本辑主题相关的论著目录(日语部分)...	沈中琦	高露露	426	

编者的话

筹备《近代中国研究集刊》时，即确定了每期皆设定一主题的“编辑旨趣”。继第一辑“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之后，本辑选定的主题是“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将目光聚焦于乡村社会，理由已无须多加申说，特别是检讨近代中国历史时，尤其如此。应当说明的是，近代中国领域的诸多问题，都在围绕乡村社会的研究中，透露出转变的枢机。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无论是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还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都已见过太多类似的表述。但同样是“缩影”，其图景却有着霄壤之别。帝制时代对乡村的表达，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之类，所烙上的是理想化的印痕。黄树民讲述“林村的故事”时，就特别提示，在理想化的儒家世界中，构成传统社会经济基础的农民和士绅阶级一样受到尊敬，但这只存在于理论上而非现实中，而且现实差不多与理想相反。这是绵延近百年的中国农村破产和农民暴动的无数事实所早已证明了的。如今围绕“三农问题”所传递出的各种声音亦表明，我们渐渐丧失对于乡村生活理想化的“想象”，事出有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读“乡村”之沉重，正在于它身上背负着极为沉重的历史积淀。

重要的是，乡村成为突出问题，是在近代中国发生的。在古代中国社会，乡村生活也并非一片祥和，但在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变动却附加了新的动因。博兰尼(Karl Polanyi)那部公认为社会学思想中的经典之作——《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一开篇就写道：“19世纪的文明已经崩溃。”19世纪西方文明的破灭，带来了巨大转变。同样是19世纪，在东方中华帝国也经历了一场“巨变”。乡村社会也正是在这场巨变中，呈现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且，这时的中国乡村社会不是像先前世代那样，经历了动荡与破产以后，又得以重建。因为在其身边已经诞生了不

年度述评
学人学术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是以农业而是以工业、不是以乡村而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新的文明。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就点出引发乡村中国巨变的诱因:“在20世纪前半期的乡村中国,有两个巨大的历史进程值得注意,它们使此一时期的中国有别于前一时代。第一,由于受西方入侵的影响,经济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第二,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这里所说的西方入侵下经济上的变化,即是指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经济结构已强烈作用于中国乡村社会,由于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仍不清楚如何应对这一变化,因此针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常常进退失据。

按照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揭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从“天下”到“国家”,代表着政治秩序的不同安排。孟子所谓“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所表达的即是对政治秩序的安排,只不过古代中国主要“将中国看成一文化体系,而不是一定的政治疆域”。顾炎武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著名论辩,对此即有清楚阐述。在西方学理输入之后,如何确立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和基本秩序才逐渐清晰起来,时间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其中最基本的是接受了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存在——“以国家对国家”;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方能确立新的政治边界,如何安排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等涉及政治生活的问题,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而“乡村”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位置所在,由此也就逐步明晰起来,那就是乡村社会作为基层单位被纳入国家政权建设的架构中。因为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诱发现代化的直接动因即是以往的“国家能力”不足应付外来的挑战,现代化的展开即以提升“国家能力”为基本目的,而且往往是由对乡村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能力体现出来。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被从土地上抛出来而又未能为城市和大工业吸纳的千百万农民或流民,有可能也有必要被集合起来,用以铸造新的国家能力。而与之相应的是,所谓“革命事业之起也,必有中坚”,伴随“革命”话语在20世纪初年的滥觞,社会分层的观点也渐渐流行,“贵贱界”与“贫富界”问题的提出,不只是对下层民众寄予深深同情,也看到了在民众中可能蕴藏的革命热情。“革命”话语也在这种阶级论中有了充分的依托。以平民的名义,成为革命的基本落脚点。

正是在社会变动的影响下,乡村社会为各方人士所重视,并成为学术关注的对象。还在19世纪末,来华传教士就已有关于中国乡村的专书(区别于之前出版的各种旅行记录)。如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1899年就出版了《中国乡村生活:一项社会学研究》(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其中写道:“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通过对它的考察,我们将会更好地提出纠错改正的建议。我们不能过于重申中国在统一性上的多样性,因为这种断言总是暗含着这样一种局限:尽管多数情况并非如此,但在某处确乎真实;另一方面,多样性的统一性是中国一种真正典型的事实,尽管这种情况是有限的,但并非不值得我们重视。”书中对中国乡村的描绘不可谓不细致,举凡乡村结构、名称、道路、渡口、水井、商店、戏剧等,都一一呈现。重要的是注意到中国社会多样性的存在,尤其是乡村对于了解中国具有特殊意义。而由于感受到中国的乡村生活具有严重的缺陷,书中也将“基督教能为中国做什么”明确转换为基督教能为“中国乡村”做什么。

关于乡村中国较早出现的著述主要是描述性的,但此时也已开始出现针对乡村中国的学术研究。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在考察中国经济发展时,即非常关心中国的农业,在他编定的《日本书目志》中介绍了数百部有关农业经济的著作,写下了数十段评述。与罗振玉、梁启超、谭嗣同等名字联系在一起农学会,也成为当时最活跃的学术团体之一。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不少志士仁人开展了农村调查,将农民作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进行了考察。如果说在农村地区旅行的西方人,往往只注意到中国和西方耕作方式之间的差异,那么,日本人则已深入到中国腹地,撰写了一大批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调查报告。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知识界骚动和学术研究充满活力的20年,革命者和学者都进一步意识到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异,并把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粮食生产短缺、土地分配不均和农民的困境上。农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引人瞩目的大问题,在多个方面表现出来。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合作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专门研究农村问题,培养农民运动骨干。报章杂志频频发出“救济农村”的呼声,各政治党派也在积极规划针对乡村的救治之道。同时,还涌现了包括梁漱溟、晏阳初等因为深切感受到“乡村之不安”而走向乡村的实践者。按照艾恺(Guy S. Alitto)的揭示,1927年梁漱溟发现,共产主义与农人、青年知识分子之间显然并非无关,这项发现促使他形成一套并非基于物质上自利的改革计划——

乡村建设，并且相信乡村重建将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而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晏阳初，1923年在北京成立平民教育总会，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以“解除苦力的苦，开发苦力的力”为目标，并于1929年在河北定县开始试验。他在罗斯福总统“四大自由”之外竭力表彰“第五大自由”——“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也依稀透露出其针对乡村的用力所在，即力图将科学引入农村。

乡村中国之所以在20世纪20、30年代引起较多关注，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即是因为“革命中国”与乡村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所谓的“革命之谜”。孙中山晚年将他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和实行耕者有其田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以后更是走向农村，在农村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并将所领导的斗争称作“土地革命”，明确认定这是一场现代农民战争。中国革命同样也被作为全球性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被解读。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曾区分出通向现代社会的三条政治道路，即发展成为西方式民主的资产阶级革命，以法西斯主义为归宿的自上而下的保守革命，以及导致共产主义的农民革命。尤其是注意到三种类型是一些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它们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制约关系，即所谓的“落后的优越性”。一个国家所选择的现代化方式，会在下一阶段上改变另一个国家观测问题的角度：“没有英国较早的民主式的现代化，很可能不会出现德国和日本所采用的反动方式。没有这两种反动的资本主义经验，共产主义纵然出现，其具体形式也会截然不同。”不无意味的是，巴林顿把本书的副标题确定为“现代世界诞生时的贵族与农民”，确认了中国走向现代的进程与农民的关联。

而中国革命立足于乡村展开所呈现的特点，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前苏联的各类文本中，已经得到详尽阐述，西方一些学者也在努力就此作出诠释。在分析中国20世纪政治发展时，邹谠提出中国社会革命一开始就蕴藏着全能主义(totalism)政治的因素，20世纪初期面临的全面危机是中国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政治的共同渊源，它意味着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领域中的组织与制度，从而克服全面危机。近代中国两大势力集团——国共两党的壮大，说明了立足于阶级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既难以避免，也卓有成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充分肯定了将无产阶级创造性地转换为“无财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意义。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还评价说，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没有一位革命领导人系统论述过如何组织扩大参政并使之制度化的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是列宁，他实际上提供了20世纪一项意义最重大的政治革新，“布尔什维克关于政党的概念，为动员和制度化相关联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楚明确的答案”。

乡村中国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格局中浮出水面，这其中，西方因素不仅构成近代中国转变的契机，依据西方理论阐述乡村社会的性质，也构成解读中国乡村社会的理论源泉。收入本辑刊的一篇文字就特别指出近代中国乡村史的研究，所呈现出的“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景观，明显地存在着“概念化书写”的痕迹。以经济决定论为主流范式的研究者，其笔下的近代中国农村显现一派危机景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使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故只有彻底改变旧的土地制度，才能彻底摆脱危机。近年来流行的现代化范式，所呈现的乡村景观更是花样繁多，如在停滞论(珀金斯)、陷阱论(伊懋可)、过密化论(黄宗智)等理论中，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处于一种结构性或制度性的不发展状态。而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增长论(马若孟、布兰德、罗斯基)研究中，近代中国农民却被描述为有着相对自由的经济选择和较为广泛的经济机会，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高，如此等等。其实，这更说明了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自身的复杂性、多样性或发展不平衡。

长期从事中国乡村研究的黄宗智，对此曾作了深刻的检讨。他认为，近代的意识形态和学术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欧和英美世界所支配的，无论是正统的概念还是反正统的概念都来源于这个世界。而在西方的大多数理论文献中，无论是维护现存体制的理论还是革命的理论，中国从来都不是主题，而仅仅是“他者”，他们研究中国与其说是为了中国，不如说是把中国当作印证其理论的一个对象。黄宗智透过自身的研究试图说明，当初进入乡村的研究，“想显示我是如何变得在理论上‘具备了洞见’这种诱惑是极其巨大的。正是这种诱惑促使我把一些已经成型的模式运用到我的研究中”。“无产化”、“阶级联合”、“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和“道德经济”这些概念也很有吸引力，“将这些概念全盘运用到我的研究中的诱惑是相当大的，因为这些概念确实有助于理解我所收集的关于中国乡村的大部分材

料”。而稍早于黄宗智，被称作重塑了中国乡村形象的施坚雅(William G. Skinner)，也正是带着这种视野进入到中国的村庄，并且把村庄与外界联系在一起，“要是说中国的小农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中，那个世界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共同体。我要指出的是：小农的实际活动范围，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村落，而是一个基层集市所及的整个地区”。事实上，不单是美国“中国学”显示出这样的学术立场，反观中国本土，曾经涌现的关于中国乡村的种种热门话题，除了我们所熟悉的“革命话语”——将中国村庄描绘为一幅普世性的阶级斗争的图景，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初期工业化、早期工业化之类，同样也是立足于“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架构展开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表达。

阐释“中国”的焦虑，也影响到对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事实上，近代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就深刻影响着对乡村社会的检讨。这里的关键是，在“中国中心观”的主导下，无论是针对近代中国研究“纵的深入”与“横的拓展”，还是跨学科的整合，力图“在中国发现历史”或“发现在中国的历史”，乡村社会都有理由得到更多关注。因为这意味着将中国划分为较小的更易把握的空间单位来研究，而超越以中国为单位的叙事架构，所转向的自然包括乡村社会在内的基层社会。围绕乡村社会的研究，大多刻上区域史、地方史研究的痕迹，即为明证。黄宗智在1991年一篇检讨“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的文字中，就明确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当前的中国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危机是全世界历史理论危机的一个部分。这一世界性的历史理论危机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尖锐对立的终结而出现的。这一局面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机会去突破过去的观念束缚，参加到寻求新理论体系的共同努力中。我们的中国史领域长期借用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中国历史套入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理论。我们现在的目标应立足于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体系，并非退回到旧汉学的排外和孤立状态，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把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用不着特别指明，黄宗智这番话主要是针对乡村研究立说的，因为乡村研究的蓬勃展开，令其尤增信心。不久前，他就明确提出，鉴于乡村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建立一门综合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乡村学”的时机已经成熟，将来中国的乡村研究应会领先世界。

不夸张地说，方兴未艾的乡村研究，堪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为活跃的领域。且不论这些年陆续翻译出版的海外学者研究中国乡村的论著，国内学者所出版的论著，如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均取得了良好的学术与社会效应。正是本着促进中外乡村研究学术交流，推动中国乡村研究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加强乡村学学科建设的宗旨，由黄宗智和孙立平担任所长的乡村研究所已在清华大学成立。《中国乡村研究》历经三年的筹备也终于面世，2003年商务印书馆相继出版了该刊第一、二辑。其他大学设置的中国农村问题、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也都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新研究成果。

可以说，各学科纷纷进入“乡村”，构成了今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一道独特的景观。在一般印象中，对于村庄最感兴趣的是人类学家。将人类学与村庄研究等同起来，显然是不合适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村庄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它的初创时期，对村庄的实地考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于今而言，考察乡村的已远不只是人类学这一学科。王铭铭在总结乡村研究的一篇文章中，就特别提出了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乡村情结”。现在从事村庄研究的不仅有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还有历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研究的教研科研人员(甚至一些艺术家、建筑学家也参与其中)。历史学尤其是社会史的村庄论述，大抵是依照“国家与社会关系史”或“民间制度史”的框架展开的，后来的讨论焦点，主要是古代“社”的制度的双重角色问题；文学人类学的论述，则更多地包含有“文化苦旅”的意味；哲学和政治学的论述与“国家与社会关系史”之间构成密切关系，但更注重当前实践——如村民自治选举——的运行逻辑与地方反应。可以说，“现代性、国家和村庄的地方性知识”是不少学者进行村庄研究的“三个基本维度”。

一本小小的集刊，当然难以完全反映近年来围绕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取得的进展，不过，这些文字多多少少说明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在进入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问题视野也因此各有不同。为本辑提供文章者多是这些年乡村研究的积极参与者，所取得的成绩，自有学界的评论，无须编者在此赘言。

在第一辑出版时，编者即曾表达这样的愿望，期望这本小小的集刊能够成为研究

近代中国的众多学者的一个园地。本辑文字的出版，即有赖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这其中，张佩国先生即实际承担着组稿的任务，隆情高谊，至当感铭。还需说明的是，很多稿子交到编者手中时，已有不短的日子，只是由于出版安排方面的一些周折，拖延至今。这也是需要向各位朋友致歉的。

编者谨识

责任编辑：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